

□ 张 海

严文明先生治学严谨、思想深邃，他的研究涉及考古学文化区系、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理论、聚落考古方法与实践、稻作农业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等多个领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严文明先生视野宏大，他倡导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和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严先生教书育人，学生桃李满天下，他重视田野考古学的基础训练，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至今仍活跃在田野考古和遗产保护第一线的优秀考古工作者。

躬耕仰韶 学术发轫

严文明先生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1953年毕业于长沙一中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学习。毕业留校后，按照苏秉琦先生的安排，严文明先生专攻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仰韶文化研究成了严先生的学术起点。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仰韶村之后，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就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仰韶文化的争论仍然很多，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和来龙去脉并不清楚。严先生坚持从遗址和地层单位出发，重新梳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三里桥、半坡等遗址的材料，阐明了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到庙底沟类型的发展轨迹，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两期四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这项研究从纷繁杂乱的材料中理出头绪，由此“找到了一把开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钥匙”。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仰韶文化究竟是父系还是母系社会的讨论颇受关注，不乏研究者陷入其中。严先生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考古材料出发，在仰韶文化分期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仰韶文化的房屋建筑、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和彩陶流变等内容。尤其80年代之后，严先生从姜寨聚落布局研究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所有制，从元君庙、横阵墓地的研究提出仰韶社会以氏族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等等。这些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的考古材料，成功探索出了中国史前考古开展聚落形态研究的有效方法，确立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社会考古研究的新典范。

韩建业教授曾客观评价道，严先生积30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其学术意义绝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构筑体系 书写文明

从仰韶看中国，严先生结合自己在北大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编写教材的工作，分别对长城以北、甘肃、山东、长江中游、江浙地区乃至

移 示 来 者 以 轨 则
一 时 之 风 气

记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



严文明

1932年出生于湖南，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留校任教，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等课程。1988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常务委员等职。著有《仰韶文化研究》《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史前考古论集》《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长江文明的曙光》《中华文明的原始》等著作。

典范。

在文化大格局背景下，严先生总结了 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征，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理论。这一理论是在苏秉琦先生“文化区系类型”思想基础上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多元一体”特征的高度概括，既强调黄河、长江流域的主体性，又突出周边文化区系的重要性，同时阐明了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层次性特征，是指导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十一五”以来国家科技支撑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即以此理论为指导，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稻作起源 国际视野

除了文明起源，农业起源也是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国际热门话题。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尤其受到关注。国际上曾流行山地起源的“印度阿萨姆邦起源”等学说，而国内从事稻作农业起源研究

的多是农学家，也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了“华南起源说”的理论。严先生很早就开始从考古资料出发关注稻作农业起源问题。通过反思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结合长江中游彭头山、八十垱以及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等年代更早的稻作遗存的证据，严先生提出了著名的稻作农业长江流域起源的“边缘起源论”。他认为，华南地区气候条件好，资源丰富，相对而言长江流域冬季资源匮乏，秋收冬藏的谷物农业更适合于这里早期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稻作农业并不发生在野生祖本丰富的华南地区，而是在气候条件变异较大的边缘地带。国际上，著名考古学家宾福德等人也提出过农业起源的“边缘论”，但用人口压力来解释，并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严先生指出并非所有农业均为边缘发生，稻作农业的边缘起源是由中国南方的环境气候特点所决定。严先生边缘起源论以考古材料为系统支撑，是目前有关稻作农业起源最有影响力的学说，并不断得到新发现考古

资料的证实。

在开展稻作农业起源研究过程中，严先生十分注重国际合作和多学科研究的视角。早自1993年开始，严先生就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先后与美国知名农业考古学家马尼士合作对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等重要早期新石器遗址进行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测定了超过一万年的陶器，而且发现了超过一万年的早期栽培稻的植硅石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被评为“八五”期间（1991—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3—2005年，严文明先生再度推动了与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欧弗·巴尔—约瑟夫的深度合作，联合开展湖南稻作农业起源研究项目。研究团队先后在国际知名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科学》发表文章，用多学科的方法揭示出仙人洞遗址发现的世界最早两万年陶器的证据。这一研究成果最终入选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考古学是研究农业起源与发展中最关键的学科之一，考古学家通过科学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与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相结合，正逐步清晰地勾勒出近万年来全球各地不同农业起源与发展的路径与历史。

这其中，稻米作为当今世界粮食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三大作物之一，与西亚起源的小麦、美洲起源的玉米并列，始终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前沿课题。特别是当下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这三个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均以稻米为主食，这是现在全球范围内供养人口最多的一种农作物。因此，研究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早期历程，不仅是东亚地区史前阶段的重要内容，也对当下稻作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对我国更好地制定粮食发展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

水稻起源于何地

水稻的起源，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和兴趣，但整个研究过程漫长而曲折，仅仅在确认起源地上就争论了近百年。

20世纪初，苏联学者瓦维洛夫是栽培作物起源领域最广为人知的一位早期学者，他对世界范围内主要农作物起源地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栽培作物的起源地应该在现存的栽培品种和近缘野生种基因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依据这一理论，他提出水稻的起源地应该在印度。“印度起源说”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一直是这一问题上的主导观点。

水稻起源与发展的考古学研究

□ 秦 岭

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中国学者是著名农学家丁颖先生，自1926年在广州郊外发现野生稻之后，他在水稻起源、演变和育种领域作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贡献，并明确提出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华南地区”的观点。两派观点相争不下的状态由此持续了数十年。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陆续发现了水稻遗存，其中1973年开始发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便是众多遗址中最为著名的一处。该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大量水稻的发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也引发了对于水稻起源讨论的又一次高潮。从这一时期开始，对于水稻起源的研究主体逐渐从农学家转变为考古学家，研究思路也从寻找现代野生稻的多样性区域转变为寻找最早的水稻种植和利用的考古学证据。

随着材料的积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早期稻作证据以及历史上野生稻的分布范围等，提出了“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印度甚至泰国等地也曾号称发现了距今8000乃至9000年前的水稻，并引发了一些争论，但这些发现后

来都被证明存在问题，其年代实际上大多不超过距今4000年。同时，严文明先生积极与国外同行合作，组织开展了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环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课题，将世界范围内陶器的发明往前推进了近万年，也找到了万年以上人类利用稻属资源的相关证据。自此，“水稻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持续一百余年的学说之争基本尘埃落定。

考古学视野下的稻作起源与发展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严文明先生提出关于稻作起源的一系列相关论述之后，考古学本身的发展也为稻作起源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保障和发展空间。

首先，水稻遗存在大量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中被发现，如江西的万年仙人洞、湖南的澧县彭头山与八十垱、河南的舞阳贾湖、邓州八里岗等。这些遗址的年代大多在距今7000年以上，最早的遗址年代接近距今1万年。大量的新材料，使得对于水稻起源的探索有了研究分析的基础，同时，也扩展了最初人类利用稻属资源

的空间范围。

其次，植物考古的发展为农作物起源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水稻起源不再被理解为一个转瞬之间的革命，而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这其中有三个关键的节点：一是人类从何时开始有意识地管理和利用野生稻资源；二是水稻何时完成驯化；三是稻作农业何时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

因此，要研究水稻起源的时间和具体过程，考古学家需要建立稻属资源在一个区域内从出现到被完全驯化的时间序列。如此一来，在考古新发现提供的材料基础上，可信的年代测定结果和可靠的鉴定标准便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需求。目前，考古学所使用的碳十四加速器测年技术已经十分完善。



生物性状的改变大致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两地可能各自有起源中心的发展。之后的数千年内，粳稻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外扩散，在距今4000年前后传入印度，与当地被人类利用的一年生野生稻杂交之后，才出现了籼稻，至于籼稻再回过头来传回中国就是很晚才发生的事了。

全球化视野下的早期稻作研究

水稻的起源与发展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家关注的议题，是历史问题，在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也涉

科技考古专家吴小红教授评价道，多学科综合研究是当代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严先生不仅亲身实践，而且领导和规划了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学的发展，对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教书育人 田野实践

严文明先生一直强调教书育人的重要性，他在北京大学教学和工作期间对考古系的建设，尤其是考古人才的培养模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3年，在严文明、俞伟超先生的积极推动下，北大考古系正式从历史系分离出来，组建了全国高校第一个考古学系，由宿白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这对我国考古学科建设和考古人才培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严先生从自身的求学经历出发，特别注意到考古学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性，注意到田野考古实践的重要性。他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通过田野考古实习培养学生考古实践技能的方法和制度。考古系将大学本科阶段的考古专业学生实习分为教学实习、基础实习和毕业实习三部分。低年级学生在学习考古学基础知识的课堂之外，进行现场教学实习，增强对考古学基础知识的理解；高年级学生则要完成一个学期的基础实习，通过集中的考古发掘训练，系统学习从调查、发掘、室内整理到撰写考古报告的全套技能；毕业年级的学生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自主选择更有针对性的考古遗址进行发掘，并撰写毕业论文。严先生要求青年教师全面参与、指导学生田野工作，在田野中锻炼成长，既做到了教学相长，又为考古教师队伍建设和储备了后备力量。

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考古专业学生不仅专业基础扎实，而且各项能力出众，很快适应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并在一线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现在，严先生的很多学生不仅是考古界的学术精英或学科带头人，而且还不乏优秀的文化遗产管理者和知名的博物馆人才。在他的建议下，以田野考古实习为核心的考古人才培养模式被教育部推广至全国多个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考古人才的标准模式，对我国考古学科的建设影响深远。

严文明先生先后主持了20余次重大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项目，他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他的很多重要思想来源于田野工作的实践。他严谨务实、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不尚空谈、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深刻影响了一代代的考古工作者。



及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

比如在论及人类迁徙、语言与文化传播等问题时，稻作农业发展一般被认为与南岛语族的形成息息相关。南岛语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语系，其分布地区东到复活节岛，西到马达加斯加，北到夏威夷和台湾，南到新西兰——这也是当今充满各种争议的国际舞台。在关于太平洋岛屿的历史研究中，稻作农业一般被当作是早期人类迁徙扩张的原动力，因而在台湾、菲律宾、印尼等地区工作的考古学家，常常以寻找最早的水稻遗存作为证明和讨论南岛语族形成的主要证据。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稻作起源还跟全球暖化问题有直接的关系。科学界普遍认定，全球暖化是已存在的事实，它最主要是由人为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及甲烷的排放导致温室效应所造成。大部分人对工业化时代作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和生态系统造成全球影响的发端，也称之为“人类世”。很多专家则认为“人类世”早于工业化时代，是从农业起源发展就开始的历史进程。这其中导致全球暖化的甲烷浓度增加，被认为是同水稻生产及畜牧业直接相关。据研究，水田土壤特有的无氧环境和家畜肠道发酵都是形成甲烷的原因之一。因此，考古学家也正在同全球暖化研究专家们进行合作，通过复原和估算稻作农业起源发展扩张的规模速度，比较全球大气变化速率，进一步分析稻作这种特殊农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帮助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难题。